



今后的教育会怎样发展



教育的对象是孩子，但最操心的是家长、政府和市场。孩子是未来，所以教育是投资——现在投入，五到十年以后才有回报。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结果。

在教育体系中，政府是体系的设定者和操盘手，市场只是辅助，家长却有最终的选择权：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出国还是国内？课外辅导还是兴趣培养？政府在设立教育体系时，通常包含三个目的：一是意识形态的把控；二是建立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人才结构；三是进行经济调节，例如降低失业率、促进阶层流动、人口增长等。

所以，要想知道我们的教育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得分析和预测政府的设计，以及家长和市场的应对。这里我们不谈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主线。

家长在教育上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是培养孩子成材。成材通常要求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具备书本知识，又习得实际能力。由于家长们往往不知道也不擅长培养孩子的实际能力，就只好专注于可预测、可量化的教育结果：升学。升学的最终目的实际并非学业本身，而是希望在就业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大，于是大家就都想进好大学；由于都想进好大学，大家就得进好高中，然后是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以此类推。升学教育是一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为了不拉下，家长就必须全力以赴，孩子也就不会轻松。

根据北大财政所与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双减”政策出台前，全国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 37.8%，参与率最高的地区超过 60%；上学期间每周平均参加课外培训 5.4 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 7 小时。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的教育支出，达到家庭教育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高考制度，由于其对人才考察的片面性，往往遭到人们的诟病。但从目前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公平性是首要原则。高考仍然是当前人才选拔最为公平的手段。补习可以看成是一件针对高考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的套利行为：其目的并非为培养能力，而更是希望在高考这个零和博弈中获得优势。

这种补习套利，在中国古已有之。以古代科举制度为例，唐、宋、明、清四朝的科举状元 371 人中，来自南方的状元占比 70%，远高于北方的 30%；而彼时南方的经济繁荣程度远高于北方；清朝 112 个状元中，仅来自苏南浙北地区的状元就高达 52%；唐朝一朝 74 个状元中，出自显贵家族的子弟有 69 人，寒门子弟仅有 5 人。古时没有遍布各地的普及型教培行业，能请得起高价私塾的家庭自然有绝对的优势。随着教培行业的消失，一个我们不得不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又离不开教育的配合。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产业规划与德国类似，即注重工业和制造业，相对弱化服务业。2020 年德国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约为 20%，其中中高

技术含量的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为 60%。德国的典型先进制造产业包括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化学工业、电气电子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高端医疗设备制造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几个大的阶段的产业政策，基本都是以发展工业和制造业为重心，不断迭代升级的。从 2012 年至今，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如“调结构”、“去产能”、“中国制造 2025”、“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

在“中国制造 2025”中，特别提出了欲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这些产业大都属于先进制造业的范畴。

教育如何来配合聚焦先进制造的产业政策？德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简单地讲，德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在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先进制造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仅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重要，把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工程师、技术员同样缺一不可，而且需求量巨大。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最好的场所，而企业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最为关键的要素。

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叫“双元制”，即由企业和学校双重主体联合培养适应企业技术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德国的教育体系，默认人

的禀赋天生有所不同，人应该各尽其职。因此德国的学生，通常在小学毕业后，就会陆续据其禀赋和意愿被分流到应用型 and 学术型两种继续深造的道路。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后，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流向“双元制”的教育体系，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习。

德国“双元制”的一大特点是企业在二元结构下具有主导地位。企业开放学徒培训岗位，目的就是为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学校是为企业的人才培养需求服务的。以双元制申请流程为例，适龄青年如果想接受双元制教育，必须首先寻找愿意提供培训的企业，获得培训位置后，与企业签订合同，之后再到相应的职业学校登记入学。“双元制”学习期间，学生通常会花 70% 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性的学习，30% 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理论性学习。学生接受“双元制”教育期间的学费，由企业以发放实习工资的形式负担 70% 左右，学校（政府）和个人承担剩余的 30% 左右。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完成学制并通过由德国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后，就可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形式上与德国类似，也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套并行体系；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中专和大专教育，可以类比成德国的中级和高级职教。但与德国相比，中国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却十分稀缺。德国劳动力中，获得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才比例一共为 60%，其中接受过双元制教育的职业人才比例高达 50%；德国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者占劳动力比例为 13%。而在中国 2020 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中，

接受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才总比例不足 50%，本科学历获得者却高达 27%。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学术性”教育为主，问题是，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的本科“学术型”学生？根据《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 届本科毕业生“受雇工作”的比例仅为 73.6%，低于高职高专毕业生 10 个百分点左右。而 2020 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 年上半年 295 万美团骑手中，本科生占骑手总量的比例竟达到了 24.7%，这说明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转行做送外卖这样几乎无门槛的工作，这是对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极大的浪费。

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把这些“学无所用”的大学本科生转化为“大有作为”的先进制造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但向德国模式学习，并非易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职业教育应该从政府为主导转化为企业为主导。从德国的双元制我们可以看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人才为企业所“用”，因此德国的职教机制中涉及的主体既包含政府和学校，也包含企业和社会；在这几个角色的关系中，企业担任着主导的角色，企业提出用人需求并提供培训，学校、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匹配的服务。这是一种“以企业需求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相对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以政府开办的职业学校为主体而进行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有限。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割裂，学校的社会化程度低下，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成为必然。

第二，在学术型教育 and 应用型教育之间应该有自由公平的转化机制。中国目前的“学术”与“应用”分流机制，主要是通过中考和高考等单一的考试方式决定，缺乏互通的桥梁机制。换句话说，一旦学生进入职业教育轨道，未来就很难通过努力转换到学术教育体系。这种对学生的发展道路“一锤定音”的分流方式，会让家长和学生尽其所能利用“考试套利”去避免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而德国的学生在“应用”和“学术”教育体系之间是有切换通道的，学生在分流后也并非必须“一条路走到黑”，在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了这种灵活的转化机制，学生和家长就不会产生道路“锁死”的恐惧，而能从实际出发，最大程度上做到因材施教。

第三，“双元制”的有效运转，不仅有赖企业和学校的合作，还特别依靠政府和行会提供的支持和监督。德国的双元制体系，得益于一整套由政府 and 行业商会共同履责的管理监督机制：联邦政府下的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立法、资助、制定政策；州职业教育委员会与下属地区委员会参与职业学校的管理与协调；地区行业协会则组织实施监督双元教育落地的种种事宜。德国的各行业协会在监督企业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监管的内容包括“认定教育企业资质”“审查管理教育合同”“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831

